



芬兰短篇小说选

SUOMALAISET VALITUT NOVELLIT

西朗佩 等著 杜钟瀛 译



昆仑出版社
LIANGZUGUO BIANZHU

芬兰短篇小说选

西朗佩 等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芬兰短篇小说选/(芬)西朗佩等著;杜钟瀛译.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1

ISBN 7-80040-715-2

I. 芬… II. ①西…②杜… III. 短篇小说-作品
集-芬兰-现代 IV. I5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1475 号

本书原作由奥塔瓦出版公司(*Kustannusosakeyhtiö Otava*)提供并授权,
图片由芬兰驻华大使馆、芬兰旅游局和译者提供。

书 名: 芬兰短篇小说选

作 者: 西朗佩等

责任编辑: 张良村 刘万勇

装帧设计: 赵光明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www.jfjwyph.com>

E-mail: jfjwych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0.75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715-2/I·511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架設心靈橋梁
开拓精神空間

题芬兰短篇小说选

王蒙



序

作为外交官的经验告诉我，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思想世界，最简易和最让人舒心的办法之一是阅读优秀作品的相关性汇编。优秀作家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够抓住人们心灵深处，比历史研究著作或游记的刻画更能揭示民族特性的情感和思维方式。

我深信，这也正是杜钟瀛挑选和翻译《芬兰短篇小说选》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它将为读者开启通向了解芬兰社会从十九世纪末直至今日发展的大门。借此，通过目光敏锐的作家和深刻的思想家，人们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个时期进行观察和分析。

被译成中文的当代芬兰文学作品为数极少，因此《芬兰短篇小说选》为用中文出版的芬兰文学，——我还希望也为用中文出版的整个欧洲文学，填补了重要的空白，给爱好文学的中国读者提供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得到尽情欣赏的机会。

鉴于以上，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杜钟瀛大使精选

和翻译出版这部选集是真正的文化之举。选集和译作，始终反映着作者的个性。杜大使以这部选集为他赢得了芬兰语文学作品重要中文翻译家和我们两国间文化合作重要支持者的不可改变的地位。现在，当我们正值中芬文化合作的大庆之年，他的工作更是博得了特别的赞誉。今年是以雪尔薇·吉科宁夫人——她的一篇作品也在选集之中——率领的第一个芬兰文化代表团访华五十周年，可以认为，正是这一访问开创了芬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芬兰驻华大使 巴 鑫

2003年9月12日

作家和作品简介

芬兰短篇小说文学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发展起来的,当时诗歌、戏剧和长篇小说文学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短篇小说文学的诞生与新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新现实主义影响了整个芬兰文学,它源于现代斯堪的纳维亚文学、法兰西文学和俄罗斯文学。芬兰短篇小说文学先驱明娜·康特(Minna Canth, 1844—1897)、尤哈尼·阿霍(Juhani Aho, 1861—1921)和德沃·巴卡拉(Teuvo Pakkala, 1862—1925)的初期创作活动都从现实主义中汲取了重要的启示和激励。

德沃·巴卡拉(Teuvo Pakkala, 1862—1925):

巴卡拉的著作主要取材于芬兰的北方城市奥卢。泥煤贸易和海运事业的发展使十九世纪的奥卢变得十分繁荣,由此产生了腰缠万贯的资产者和人数众多的无产者。

巴卡拉非常关注城市无产者,尤其关注他们中间最贫困的人以及年轻妇女和孩子们的命运。

现实主义激发人们研究现实社会、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以及人的个性发展和心理状态。在现实主义心理领域中,巴卡拉是芬兰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

短篇小说《兄弟》选自巴卡拉后期创作的集子《小人儿》

(1913)。当时他已放弃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作品中所表现的强烈的社会现实主义,对意识和心灵活动现象开始产生兴趣。

《兄弟》剖析了真实、希望、想像和追忆如何融合一体,如何使其影响人们思想的问题。《兄弟》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劳拉的小女孩,她是教师家庭中惟一的孩子。劳拉的想像力影响了全家,让人预感到家庭的田园美景不过是一个幻觉。

劳拉的父母觉得期待和希望在世上已经不复存在。劳拉母亲年轻时的意中人意外地离开了人世,与现在丈夫的结合没能带给她任何激情,母亲通过女儿劳拉审视了自己已经失去的对未来的信念。

兄弟出现在传统的圣诞节之夜,行乞的孤儿海伊基营造了一个小男孩过圣诞的假象,还通过女佣莱娜突出了故事的神秘和宗教色彩。“巴沃·恩蒂基督”指的是路德教清教主义时代芬兰旧赞美诗中出现的将罗马天主教教会领袖称作反对基督的人^①的传统习惯。

巴卡拉的心理现实主义受到了世纪交替时期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玩偶和玩偶之家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远在知识和理智以外的东西通过劳拉和她的假象也闯进了现实。

人生不仅是这一方面,运用理性的方法对此也并不能完全理解,那孩子仍介于通常的现实与另一种神秘的现实之间。

阿伊诺·卡拉斯(Aino Kallas, 1878—1956):

卡拉斯的丈夫是爱沙尼亚人,因此她的大半生是在爱沙尼

^① “反基督的人”芬兰语“Antikristus”与“恩蒂基督”的芬兰语“Anttikristus”同音。

亚度过的,她的许多著作也取材于爱沙尼亚的人和事。

卡拉斯一八八七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著作,那是一部诗集,后来她专门从事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创作。《客人》选自她名为《船舶离去的城市》(1913)的集子。

土地测量员保尔·卡拉斯克前来访问一对爱沙尼亚——俄罗斯老夫妇。老人们的独生女儿玛丽亚·亚历克赛德罗夫娜几年前去世了,她在彼得堡与卡拉斯克有过一段秘密的关系。

老人们告诉他,他们的女儿与皮切尔鲍姆结婚时已有身孕,皮切尔鲍姆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粗暴,致使妻子流产。

老母亲与相信宿命论的父亲极其悲痛,母亲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她要为女儿报仇。

卡拉斯克询问老母亲能否将造成这一不幸的人视为吞噬人命的大海浪,老人家对毁灭她孩子的人怀有本能的仇恨,她不能将这一不幸当作无形的命运,她无法容忍。

作为这篇短小紧凑的小说的结局,老母亲终于知道了真相。

《客人》运用二十世纪初叶芬兰文学中普遍流行的新浪漫主义笔法,既有戏剧性的安排,如从树枝上落下成熟的樱桃所代表的那种象征性的点缀,也有惊心动魄的紧张、仇恨和爱怜。生命的神奇和神秘的力量决定了人的命运,谁也无法逃避。

约埃尔·莱赫托宁(Joel Lehtonen, 1881—1934):

《恶魔的提琴》(1904)是莱赫托宁的处女作,它是芬兰当时新浪漫主义的典型作品,不过他很快就放弃了新浪漫主义,开始采用现实主义的讽刺笔法。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如他曾经译成芬兰语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薄伽丘的作品,成了他的创作源泉。

《阿帕利·穆蒂宁上战场》选自莱赫托宁的短篇小说集《死了的苹果树》(1918),讲的是芬兰独立(1917)后不久试图发动革命的共产党人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内战。

主人公穆蒂宁是人道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他代表资产阶级思想,但坚信芬兰人民中间固然存在着种种社会矛盾,但他们的祖国是共同的,理想也是共同的,永恒的。他无法理解郁积在无产者胸中的那种突然迸发的仇恨。

穆蒂宁当然反对赤色分子,但当战斗临近时他又无意介入,他要置身事外,让自己躲藏起来。他认为,是资产者的自私和贪婪造成了无产者的愤怒,以致发展到当时的暴力行为。

无产者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人,他们手里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和一小片森林被骗走,他们没有了土地母亲,失去了土地就是失去了根,使他们的孩子消失在城市和工厂中。新时代的变革过于迅猛。

残酷的资本主义胜利了,然而失败者也成了残酷的人。土地母亲要为失去的孩子复仇。穆蒂宁终于加入白军,打垮了发起攻击的赤色分子。

在穆蒂宁眼里,赤色分子几乎成了禽兽,无法让人理解,是令人畏惧和仇恨的另一种人种。而人民再也不是十九世纪民族浪漫主义所赞颂的令人敬慕的人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暴露出欧洲的人生信念和启蒙时期乐观主义理性信念的脆弱,社会正在变成禽兽争夺猎物的丛林。穆蒂宁所代表的旧知识分子没有把握现实的能力。

穆蒂宁身上包孕着对传统等级社会经不起现实压力的文明和人道理想的讽刺和嘲弄。人道主义者穆蒂宁否定赤色分子的人生价值观,但小说结尾时他在类似神经错乱的狂热中打死了

一名素不相识的赤色分子俘虏，自己也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阿帕利·穆蒂宁上战场》在以芬兰内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是观点最鲜明，笔法最锋利的作品之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内战时期芬兰各社会阶级之间的不信任 and 愤激情绪一直延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玛丽娅·约图尼(Maria Jotuni, 1880—1943):

约图尼是芬兰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多数以男女之间的关系为主题，主人公有中产阶级，也有平民百姓，她的笔调有时轻快幽默，有时尖酸刻薄。

《海尔曼》选自约图尼题为《爱情》(1907)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主人公海尔曼极好地代表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替时被称为十年期年代的人物形象。与许多其他同代人一样，约图尼也对源于尼采思想的个人意志论和生命力进行了探索。

《海尔曼》讲的是两个年轻人，海尔曼和阿丽娜的爱情关系和最后结局。阿丽娜是一个普通女子，海尔曼则是紧跟时代步伐的人，在他对待两性关系、感情生活和女人的态度上似有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在海尔曼的处世哲学中也能看到与当时时代潮流相吻合的对真实美的追求。

海尔曼没有固定的世界观，他将女人当作工具以达到感情上的享受从而逃避内心的空虚，然而性满足只是一时的，被爱的人很快会失去魅力，他的毛病遂将重新暴露。

约图尼剖析了世纪交替时文化生活中出现的过渡期。十九世纪末，新的科学世界观打碎了教会和基督信仰的传统世界观以及以它为基础的道德观念，但是自然科学的理想主义并没能填补当时形成的价值观空白。

人们想从唯美主义、神秘主义和精神贵族的思想中寻求帮助,但总是枉费心机。海尔曼和当时芬兰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许多精神颓废和思想空虚的其他主人公都是危机的象征。海尔曼强调人的个性和差异的意义,但自己却缺乏个性所要求的力量。他是懦弱的男人,嘴上大谈个性无上崇高,然而又需要一个他所蔑视的普通女人的支撑。

在约图尼的作品中,女人常常是生活的中心,男人则成了牺牲品,女人虽然只管具体的事情,但在实际中却受她们操纵,男人们往往表现软弱,表现得滑稽可笑。

F.E. 西朗佩(F.E. Sillanpää, 1888—1964):

西朗佩是惟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39)的芬兰作家,他既写短篇小说,也写长篇小说,是二十世纪前叶最著名的芬兰作家。

西朗佩坚定而乐观地深信,人虽各有文化背景但都是大自然整体的一部分。这是他创作思想独树一帜的特征。

集子《天使的守护神》(1923)由十篇以儿童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组成,其中《一个叫泰勒尔沃的小女孩》最负盛名。集子末尾附有一篇题为《关于我自己和为了我自己》的小品文,论述西朗佩自身世界观的依据和儿童在他世界观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西朗佩将人分成下层和上层,但是这种划分并不决定于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或者贫富状况,而是根据各人的品德及“思维和观察事物的方式”。在西朗佩的作品中,品德高尚的人通常是弱小的,或者因为与众不同而难于适应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而遭受苦难和折磨。

犹如泰勒尔沃的故事所讲的那样,差异性早在童年时期就

已可能反映出来了。贫苦的孤儿小女孩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但她的身上已初露才华和智能,“心不在焉”或许正是她的智能和情感充满活力的反映。停滞不前的农村社会对此嗤之以鼻,甚至连为泰勒尔沃全力以赴但没有文化的养父母对她也不能理解。

泰勒尔沃悲惨的命运不过是一场平平常常的小悲剧,在儿童死亡率很高的年代,这种情况司空见惯。作家运用了巧妙的手法,他尽量不用笔墨去刻画泰勒尔沃本人,也很少描写她的感受、思想甚至她的外貌。

在无可替代和独一无二的人生中,西朗佩将泰勒尔沃之死看作为似是意外发生的损失。

作家以局外人的冷漠,用逗乐的方式,揭示了小女孩的欢乐、忧伤以及无谓的些许希望。读者可以从作家的态度中为确立自己的立场得到启迪,抒发出自己的同情之心。

西朗佩在刻画情节的过程中,力图用作家、读者和泰勒尔沃之间关系的发展,来阻止使小说仅限于在感情上描述小女孩的命运或表述传统的批判社会的现实主义。

小说的任务不在剖析儿童教育或社会福利方面的弊端,甚至不在探索成年人为何不能理解儿童的生活和感受。小说要研究的是同情和怜悯错综复杂而很难达到的那种心理整体。

雪尔薇·吉科宁(Sylvi Kekkonen, 1900—1974):

雪尔薇·吉科宁一九四九年才开始文学创作,作品不是很多,这可能因为她的丈夫乌尔霍·吉科宁历任政府部长、总理,又长期担任芬兰共和国总统,需要她参加许多社交活动,占用了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走廊里的故事》讲的是芬兰内战后的春天到一九一八年圣诞节之间发生的事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欧洲继续进行。芬兰的白色分子在德国人帮助下战胜了赤色分子,但社会大动荡依旧,一些人还期望芬兰实行君主制以替代共和制。因为战争,国内危机四伏,灾难深重,大批老百姓因为传染上正在蔓延的严重的流行性感冒——西班牙病而死去。

在姐姐的鼓励下,受自己的理想的驱使,十八岁的小说主人公卡伊娅决心学习当护士,她进了一家大医院做实习生。可惜不久后她意识到自己缺乏坚定的信念,觉得自己难以胜任护士工作。

医院虽是封闭的社会,但是社会上的矛盾和问题在里面不能没有反映,对人际关系不能不发生影响。内战将医务人员甚至病人同样分成了两派。

生与死,童年、青年、壮年与老年,健康与疾病,强壮与脆弱,恐惧与希望,欢乐与失望,理想与玩世不恭,贪婪与无私,决定着人们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同样赤裸裸地暴露在医院这个微型的世界中。

医院清洁工安妮说了一句精辟的、切中要害的话,它反映了突出真实感的主题。安妮说:“既没有白色分子,也没有赤色分子,只有经受着苦痛和需要帮助的人。”

医院如同危机中的祖国,连接着各个病房,护士们日夜奔忙的走廊象征着富有青春活力的中间地带。作为代表人物的卡伊娅已在那儿长大成人,从理想主义演变成为能够理解现实,学会适应现状的人。

《走廊里的故事》最后附有一篇相对独立并有自己标题的

《尾声》。二十五年后的一九四三年，续战^①的阵地战进行得如火如荼，国家的命运又在危急之中。

卡伊娅为了躲避轰炸而移居农村。《尾声》写的是卡伊娅乘坐长途汽车去附近城里办事和回家的情景。这时的卡伊娅已从年轻姑娘变成了成年妇女、妻子和母亲。

不管情况如何，人总得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已经成年的卡伊娅再不为自己的前途和理想疲于奔命了，她只希望重见和平，摒弃黑暗，让光明“透过门窗自由自在地为过往行人照亮道路”。

潘蒂·韩培(Pentti Haanpää, 1905—1955):

韩培多以男性作为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其中有军人、森林工人乃至流离失所者和情况特殊的男性群体。《酗酒》选自他的短篇小说集《苦涩的甜蜜》(1939)。

《酗酒》中的主人公普克苏军士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但他所以如此还有其他原因。

酗酒被普克苏军士当作摆脱他生活中所陷入的死胡同的出路，然而沉迷于酗酒带给他的解脱和快感不过是自欺欺人，最后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工作没了，官职行将丢掉，钱财耗尽，男子汉的气概和名声也不翼而飞。

普克苏与人们疏远了，他开始厌恶甚至仇恨他们，在他的心目中，甚至自己的孩子和妻子也成了累赘。普克苏正在走向再

① 1939年—1940年芬兰和苏联之间爆发战争，称作“冬战”，1940年3月13日媾和。1941年7月芬苏之间再次爆发战争，俗称“续战”，1944年9月媾和。

无希望和前途的绝境。小说结束时,妻子对丈夫的粗鲁话所作的温顺的反驳和普克苏的自问,意味着主人公已在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和应该怎样生活下去的问题。他笼统地说:“总得干些事嘛……可不是吗?”

普克苏没有回答自己的提问,一条谚语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它的大意是:生活将击垮挑战者,不久后即使再强有力的人也会被上帝的磨子磨成粉末。

萨姆利·巴罗宁(Samuli Paronen, 1917—1974):

巴罗宁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名为《亚当村之夏》的长篇小说,那是一九六四年,当时他已四十七岁。在以后二十年中,他又发表了不少作品,经常运用现实主义的笔调描写穷苦人和受压迫者的生活。《孤独》选自他的短篇小说集《这是八号房》(1969)。

《孤独》描写一个名叫维尔霍的小男孩生活中的悲剧,他的母亲因为染上流行病不幸去世,小男孩第一次亲身面对死亡,经过很长时间后他才明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巴罗宁善于揭露有钱人的冷酷无情,《孤独》中的胖商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别的成年人态度较好,但也不很理解孩子内心的悲痛。成为孤儿的维尔霍终于慢慢地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使自己成为比较独立的人。

维约·梅里(Veijo Meri, 1928—):

短篇小说集《大地尚未披上绿装》(1954)是梅里的处女作,《子弹壳》即选自这本集子。梅里是职业军人的儿子,在军营中度过了他的童年。他写过许多以和平时期军人生活和以战争为

题材的著作,是芬兰战后主要散文作家之一。

《子弹壳》写的是一个小男孩的经历。故事开始时他五岁,但正面临着生活中的重大转折,因为七岁要上学。小说时而忧伤时而风趣的刻画均源于小男孩对世界的想像与现实生活的冲撞。

《子弹壳》的主题在葬礼之初就显露了出来,后又两次再现,直至小说结束。

对孩子来说父亲永远是生活的榜样。子弹壳是父亲军人世界之物,小男孩感到幸福,因为他可以在家里拿子弹壳做游戏,视它们为军人,让它们听从他的指挥。但是父亲收回了子弹壳,为了重新利用,他将它们送回了军营。

学校开学前的头天晚上,父亲答应打靶后给小男孩带回一些子弹壳。

上学第一天过得很不寻常,那是在适应新生活、打架和受罚的过程中度过的。父亲的部队去靶场打靶,晚上小男孩急切地渴望得到子弹壳,可是父亲将它忘得一干二净,还说这么大的孩子不该再玩那些玩意儿了。

小说结尾时,子弹壳的主题因为男孩儿们赶往射击场收拾子弹壳而达到高峰。因为理解错误,小男孩从兴高采烈下落到极度的失望之中。他蒙受耻辱,觉得无法忍受,无地自容。

短篇小说《子弹壳》是梅里真实地刻画日常生活的典范。子弹壳是空的,它的价值在于由什么人往里面填进什么东西,赋予它什么含义,这是具有现代派特征的可以表达多种思维的范例。

恩蒂·许吕(Antti Hyry 1931—):

许吕是二次大战后芬兰最卓越的散文作家之一。《森娅》选